

刘盼遂的海棠诗——文化的毁与存

○ 王存诚



王存诚

196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，随即在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（现热能工程系）任教，1979—1982年作为访问学者在剑桥大学涡轮机实验室做研究，教学科研领域涉及动力机械、能量系统以至生物热物理。1999年退休后涉足文艺，参与编辑《高旅诗词》、《聂绀弩致高旅信》（刊登于《新文学史料》1999年第2、3、4期）、《邵荃麟百年纪念集》、《聂绀弩全集》（旧体诗与书信部分）等。

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刘盼遂有《海棠诗》五首，事关文化的传承存毁，值得一提。先看诗和跋的本文：

海红豆出海南天，记入巨唐海药篇。
欲为名花问初地，夷讴卉释已三年。
乐寿堂前几万枝，山翁曾共倒金卮。
而今狼藉殷红里，海气昏昏忆奘师。
妖韶帚子两三窠，省得他年载酒过。
清华园里西南角，无主风前奈尔何？
一种丛生命妇花，春来还发故侯家。
空蒙香雾昏黄院，无复当年燕子斜。
几丛粉泪映回廊，少妇丰穠少女香。
底怪江东储教授，也从花影忆红妆。

右庚辛之际咏海棠诗五首，一哀海南，二念寅师，三伤清华陈宅海棠，四吊故恭王府花圃，五调老友储一广也。

庚辛之际是指庚辰、辛巳之际，也就是1940至1941年之间。当时刘盼遂滞留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教书，诗说的是海棠，感慨的却是民族文化，异族统治之下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令人唏嘘之处在于，倘非遇到有心人，连这点感慨也将泯灭无闻了，谁还知道刘盼遂曾有此诗？刘盼遂（1896~1966），河南息县人，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入学考试的第一名。第二届的魁首是他的同乡谢国桢（1901~1982，安阳人），而这两届的第二名吴其昌、刘节都是浙江人，从而传出了“河南出状元，浙江出榜眼”的佳话。

这五首诗因为题在他的学生聂石樵、邓魁英夫妇的折扇上而得以保存。聂石樵这位有心人还花了20年的工夫收集和整理老师的遗著，这才有一部《刘盼遂文集》在作者死后30多年的2002年出版。刘盼遂的海棠诗就发表在文集的附录《怀

念刘盼遂先生》一文中，聂石樵、邓魁英夫妇在文中还对这5首诗作了笺释，有兴趣者不妨一阅。

文集中有《观堂学〈书〉记》、《观堂学〈礼〉记》和《〈说文〉师说》几篇文字，是刘盼遂整理的他老师王国维的讲课笔记。人们常说王国维讲课难懂，不善于与学生交流，但到了刘盼遂这位有心人这里，不但听懂了，而且比较系统地整理保存下来，使人们得以一窥王国维教学的风采。

这些例子说明了，文化借纸面文字的传承如何因有心人的努力而不绝如缕。

文化遗产的另一种载体是文物。最近清华简的收藏、保存和研究成了文化界的一道风景线。其实凡是记录了当时事件、文书的“吉金”、“贞珉”莫非文史研究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，而它们往往遭到毁灭的厄运。有鉴于此，刘盼遂特别写了《中国金石之厄运》一文，从历代文献中搜集罗列了自周朝至清代金石文物遭毁的诸多事例，最后引叶鞠棠的《碑厄》一文作结。叶文中提到，除了战火和自然磨损之外“碑有七厄”，列举了刻石所以被毁的种种缘由。

当代事例不必远求。徐葆耕教授称王国维纪念碑为“清华第一文物”。而这座碑得以保存，却凭借了一种特殊的机缘。2007年6月3日的《广州日报》上，该报驻京记者柳建云在采访了徐葆耕教授之后有这样一段报道：

1966年，“文革”浩劫开始了，这个碑也在“破四旧”的风潮中，被红卫兵给推倒后不知所终。

到了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很多清华的老学长回校找王国维纪念碑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个碑是他

们亲近王国维的缅怀寄托所在，当时有人说，纪念碑被红卫兵扔进校河里了，但清华校方找来找去，却在校河里找不到纪念碑的半点痕迹。

后来，终于在清华力学系的实验室里找到了。原来，“文革”时，倡导“白手起家”，实验室为了研究激光立体照相技术，需要一个实验台，于是把石碑拉到实验室里，盖上一层隔离布，就成了实验台。当时清华校报还宣传说，实验室艰苦奋斗，不花国家钱，自己找了一块石头做成实验台，值得大家学习。

不幸中的万幸是，做实验时纪念碑由于隔离布受到保护，实验室也没有对纪念碑重新打磨。纪念碑奇迹般地一直没有受到破坏。

这种情况属于“七厄”中的第二厄，即改作其他用途。所幸此碑未遭破坏。

清华尚有不少比这要早的碑。其中有一座受到了善待，那就是1983年在建筑工地上发掘出来的任亮墓碑。任亮是圆明园护军营“技勇八品首领”，1860年因抵抗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而英勇牺牲，次年“圆明园技勇三学”为他公立此碑。这座碑成了当时军民抵抗侵略的有力证据，现保存在位于五塔寺的“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”内，供人瞻仰和研究。

其他的古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例如近春园遗址园内有一座碑，正面题“近春园遗址”，背面记载了1979年重修此遗址的经过和近春园的历史。姑不论所述史实有所出入（所记近春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并非事实，已有多人考证出，近春园是后来清廷自行拆毁以取材补修圆明园的），立碑记史本是好事，可惜的是，此碑是磨掉旧文重镌而成的。原来的碑文是什么？不得而知了。这属于“七厄”中的第四厄，即“尽铲旧文，别镌新制，改为己作，渐灭无遗”。

还应有一座重要的碑，即永恩寺碑。现清华二校门以北一带原为明朝即已存在的永恩寺，清华初建校时寺还在，当时才遣散僧众改建校园的。如此古寺，碑必不止一座。所说的这座碑，是康熙的三皇子胤祉所立。它所以重要，一是碑文为清华大学旧址熙春园的建园年代——1707年——提供了重要的旁证；二在它的艺术价值：碑文由当时的大学者陈孟雷代撰，由书法家胤祉书写。并此也可称“三绝”了。可惜的是碑已无存，倒是另一位有心人苗日新教授从陈孟雷的《松鹤山房文集》中发现了这篇碑记。

其他碑呢？我校社会科学系一位校友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校攻读研究生时，曾亲见多座残碑正被集中起来伐作石材，供修桥补路之用。这也属于“七厄”之第二厄，不过没有王国维纪念碑那么幸运了。或许当事者以为那些碑上记载的非封建迷信鬼道理，毫无保留价值吧！

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还是人，是学者。人的毁灭是最可悲的。如果说王国维的自沉是自觉地殉“文化”（陈寅恪、徐葆耕均持此说），那么刘盼遂夫妇在1966年双双被抄家的“联动”害死，就是被动地成为“文化革命”的祭旗牺牲了。师徒二人不同时而同命，令人感慨。更令人感慨惊叹的，是他们之死竟有一位共同的见证人，那就是刘盼遂的师弟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位状元谢国桢（刚主）。

1927年谢国桢带一位朋友晚上去拜望王国维并请他为二人题扇，第二天王国维就自杀了。1966年谢国桢去看望了刘盼遂并邀他至自己家，交谈甚欢，几天后刘盼遂就遇害了。他思想感情由此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。他有《忆刘盼遂》诗五首，第三首及附记为：

朝看芙蓉映朝霞，暮看兰蕙茁新葩；
握手言欢从此去，建国内外即天涯。

刘盼遂兄与余生同豫中，同学清华，又同客春明逾四十年。盼遂性情纯笃，学问渊博，记诵详赅，言之有据，每相过从，获益良多。犹记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之晨余访盼遂兄，见其小园中盆植荷花，纷红骇白，映以朝曦，鲜艳欲滴，晡间约盼遂兄至吾家赏兰花，佐以盘飧，晤谈至快，不觉夜阑，余送至门外，举手言别，再谋良晤。孰意未隔数日，君为“联动”所冲击，误伤自沉以没，所藏书籍，荡然无存。余闻耗潜至其地，则见君家双扉顿开，日影在墙而已，每一思之，有馀痛焉。

第五首为：

两手如锥但持螯，老来忽漫习风骚；
若使刘郎今健在，一日定当走千遭。

谢诗作于改革开放之后，此首感叹刘盼遂未能赶上好时候。刘盼遂的清华国学院同学们，凡能活到这时的，如谢国桢、姜亮夫、王力、高亨等，无不在晚年再次焕发学术青春，建树良多；不少人还诗思泉涌，佳作迭出。此不仅清华诗坛之幸，亦中华文化之幸也。笔者为清华校庆百周年蒐诗采风，得履前贤之迹，亦不胜欢欣鼓舞矣。❶